

从“地域”出发——

笔谈(十一)

作为中国文学总体性切片的地方文学

□刘大先

■ 形形色色的小传统，带来文学上的风格的传承。“地方”有赖于这种文学的编码才获得其“地方性”

■ 内容、平台、观念的综合，大传统的框架中，小传统得以具身性的显现，构成了某个地方文学的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地方文学命名的语词由此方能建构其鲜活的肉身

竹、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曾华鹏、陈辽、范伯群、董健、叶檐、黄毓斌、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吴俊、费振钟、汪政、丁晓原、季进、何平等20卷；《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涵盖陈白尘、胡石言、陆文夫、高晓声、张弦、庞瑞垠、赵本夫、储福金、朱苏进、黄蓭佳、范小青、周梅森、叶兆言、韩东、苏童、毕飞宇等16种；《江苏青年批评家文丛》囊括了沈杏培、何同彬、李玮、李章斌、叶子、韩松刚、臧麟、刘阳扬等8位新锐；《江苏当代作家评传》也已经出版了陈白尘、胡石言、高晓声、张弦等数卷。晚近刚刚出版的《江苏新文学史》，以1892年江苏松江人韩邦庆创办《海上奇书》杂志和连载《海上花列传》为起点，以2019年为迄点，分为文学思潮与批评、小说、通俗文学、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戏剧影视、儿童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网络文学、文学报刊等12编共29卷，涉及作家3419位、作品13107篇(部)，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的总结。另外，还出版了《江苏文学编年》(江苏当代作家在海外)和每年的《江苏文学蓝皮书》等述介与资料性著作。这些作品整体全面地展示了江苏文学现代以来方方面面的成就，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无论从规模体量，还是深度质量上，都属于独此一家。

“文学苏军”可以说已经构成了现象级的存在，而“文学新苏军”无疑有着更加明确的当下性、现实感和培育性。其中，“里下河文学”的建构就是显例，我曾经在一篇参与讨论的文章中将其归结为从怀旧到写实的抒情风貌。虽然这是一个以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苏北的里运河与下河之间的地区来命名的文学，但无论从概念的发明、历史的回溯，还是横向的扩展与未来的瞻望，里下河文学都已经超越了地方性与区域性文学的范畴。尽管这个提法的初衷可能更多着眼于地方文学与文化遗产的整合与再造，在实际的讨论、运行和操演之中，里下河文学无疑逐渐具有了当代文学微缩景观的意味。这个区域性的地理概念并没有禁锢住在此诞生、定居、出走、移民的作家所带来的繁复而多样的文学呈现，空间意象独特性表达的嬗变某种程度上显示的是人性和时间上的普遍性变迁。当我们因为种种或隐或显、或远或近、或深或浅的地缘关系而与里下河产生关联的作家作品关联起来，他们就呈现出一种隐秘的精神脉络，显示了我们时代城市与乡村现代性进程中情感结构的变化。“文学新苏军”也可作如是观，它固然是以江苏作为起点来策动，却并不是孤立与单向度的叙述，而是当代中国文学总体性中的一个切片。

三

某个地方文学，最直观的面无疑是地域的概念，来自于某种文化地理学的特定认知。像中原、三秦、齐鲁、荆楚、巴蜀、燕赵、吴越、山陕、潇湘……这些区域郡望，经过长久的文化积淀，携带着集体记忆的内涵；“陇头”“姑苏”“长安”“浔阳”“江陵”“楼兰”“扬州”……这些地名经过在诗词歌赋中不断打磨，早已成为风花雪月那样的程式化意象。地方间情感与风格之间形成了某种自然而然的联系，诸如“骏马西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的不同美学内涵。梁庭望先生曾借用人类学和民族学中“文化圈”理论，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民族分布、文化特征四个方面考察，将中华文化划分为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

稻作文化圈四大板块，并将各板块的文学进行了对应论式的描述，就是这种地理—族群—文化决定论的显现。

要指出的是，静态性的区域文化侧重空间因素，而多少忽略了时间的因素。地域特征在当下愈发演变为了一种固态的遥想和回忆，某种本质化的“地方性”可能只存在于前现代的“超稳定社会”，那种稳定性伴随着工业化、交通、信息与人口的大幅度流动，在当代已然分崩离析。以江苏而言，苏北属于中原文化，江南属于吴文化，中间的是淮扬文化和金陵文化，这些前现代的遗留本身就是多样的，更遑论贸易与交通、迁徙与流动、合作与竞争已经让不同的板块之间彼此交融互动在一起。早先似乎凝滞或者变动迟缓的空间被政治、经济和技术打开，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成为现代性的表征，几乎不可能有人能用僵化的特点与特色来概括某个区域的文化与文学。

然而，同本质主义的刻板与僵化差不多，“多样性”其实也是一个被滥用的词语，可以通用到几乎所有地域，也就失去了其具体的指涉性。“地方”因而还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即便不同的地域都在某种现代化的路途途中愈加趋于同质化与雷同化，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某种由历史、文化同地域相结合而形成的某种地方传统。这种地方传统是空间经过文化编码后的结果，属于风景、器物、制度、组织之上的精神与情感层面，并不像前者那样易于变动，而在内核上具有某种稳固性“小传统”，成为某个地方树立身份的关键所在，同“大传统”之间构成隐隐约约的补充关系。

形形色色的小传统，带来文学上的风格的传承，拿南京来说，“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江春不肯留归客，草色青青送马蹄”“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的层累式书写，奠定了风流蕴藉、感伤清绮的格调，成为一种特有的格调，甚至作用于现代以来的小说与散文书写之中。

“地方”有赖于这种文学的编码才获得其“地方性”。如今的南京与江苏文学显然已经突破了这种局面，而要“地方”具备现实感，超越了某种物理空间或心理空间，还附加上了文化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含义。比如新兴的网络文学，就很难再用固有的“地方性”进行阐释与归总，江苏网络文学这种提法如果成立，地域元素只是附加的点缀，而更多指向于特定的观念、情感与价值——类型上的突破与创造，观念上的探索与发明。

概而言之，内容(主题题材与形式创新的合一)、平台(物质载体与传播渠道的开拓)、观念(情感结构与价值理念的(生产)的综合，大传统的框架中，小传统得以具身性的显现，构成了某个地方文学的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地方文学命名的语词由此方能建构其鲜活的肉身。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关注

从90年代中期步入文坛以来，“70后”作家遭遇的最大质疑便是历史书写的匮乏。这也联结着一个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充分解释的论题：“70后”一代如何讲述历史？如何书写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近年来，知命之年的他们已经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历史书写作品。李浩的《如归旅店》、徐则臣的《北上》、周圆璞的《多湾》、李骏虎的《母亲世家》、葛亮亮的《朱雀》《北鸢》、李凤群的《大江》《大风》等长篇小说表明，这代人正在以自己的理解“重返”历史场域，以融合着实地考察、历史典籍、新闻报道、书信、日记等元素和丰沛想象力的写作传递出了历史叙事的意愿。黄咏梅的“代际对话”或“代际对望”亦可纳入“70后”历史叙事的话语流，这些作品为“每代人都拥有讲述历史的方式”提供了叙事探索。

从2013年的《小姨》起，黄咏梅的创作开始出现了一种变化，即通过不同代际之间的对望与对话去“记忆往昔”或者说“抵抗遗忘”。在这种变化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当作家的知识、阅历、思想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如果还愿意继续探索，便会进行一番自我“革命”。当然，这种“变”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天翻地覆，而更接近于缓慢的“改良”。2013年迄今，黄咏梅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篇关于“代际”与“记忆”之关系的书写，篇数不多，十年下来却足以构成一种“现象”。

熟悉黄咏梅的人都知道，她是2002年从“南国叙事”开启写作生涯的。随着她从“南方以南”(广州)迁往“南方”(杭州)，书写地域在变化，而擅长于世俗烟火、凡人心事、微物小情等人间行状的精细打磨始终未变。《小姨》承续了她一贯的温婉细腻，但叙事方式与精神面相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小说通过“我”的视角讲述小姨的生活与情感。出生于1970年的小姨曾经是“天之骄子”，后来却成为一个颓废、不合群、不恋不婚的“中年怪阿姨”。这篇小姨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资深剩女”的故事，它深潜着时代创伤直到很久以后才被人们纷纷谈起。当小姨大学时曾经暗恋的师哥20多年后再度出现时，她重燃爱的希冀，但再见面之后就彻底死心了。对小姨来说，记忆中的他表征着一代人曾经浩浩荡荡的理想主义，可现实中的他已被“招安”，跌入圆乎乎的“成功者”行列。在小姨看来，这种“成功”毋宁说是一种背叛。最后，小姨疯了。这个结局看上去很极端，但又具有某种必然性。那是一直坚守理想主义的人的唯一出路。当黄咏梅在《小姨》中以“隔代”凝视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她或许并未完全意识到这可以构成一种讲述历史的方法。就像海登·怀特所说，我们无法找到“历史”，能找到的只是被编织或被阐释的历史。因此，历史叙事更多地与“文学性”或者说“诗性”的问题联结了起来，而“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可以是无限的。当“历史”“记忆”成为叙事化的对象时，文学就代替了科学，朦胧就代替了精确，诗意就代替了枯燥。通过“我”与小姨的对话和对望，黄咏梅“发明”了一种能够包孕丰沛内涵的叙事范式：或通过下一代讲述上一代的故事，如《父亲的后视镜》《昙花现》；或直接呈现两代人的不同人生，如《给猫留门》《翻墙》；或将年长者与年轻者的生活、观念、思想等方面的差异予以对比，如《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蓝牙》《夜间暴走》。无论哪种情形，隐含的叙事都指向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景观。

从故事来看，这些文本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叠床架屋的叙述层。它们通过“我”或叙述者的视角将亲朋好友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中间有时还夹杂着外公讲小姨的故事、母亲讲父亲的故事、母亲讲姨姨的故事、同事讲同事的故事、邻居讲邻居的故事等枝枝桠桠，由此碰撞而产生出了多重声音和风格。随着不同的讲述层被打开，不同时空中的故事也一段段被络绎召唤而出：在《父亲的后视镜》中，父亲在新中国诞生成长的历史历程毋宁说是一部发展和巨变的当代史；在《给猫留门》中，童趣盎然的“猫事”牵连起了令人叹惋的过往之“人事”；在《昙花现》中，“我”转述的母亲和姨姨们的故事则在女性的婚恋困境中激荡起了那并不遥远的历史的涟漪。空间的维度柳暗花明，时间的拓片嵌榫叠加，那些篇幅不长的文本竟然氤氲出了一抹抹凝重的历史感。

此处不妨以2023年的《夜间暴走》具体阐释之。黄咏梅曾谈到，当代社会中“勇敢”等美好品质正在消失，她想通过小说去反省这种社会性和公共精神的匮乏。“勇敢”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这在小说中通过“代际”的对话/对望层次丰富地传达出来。这里既有父一代和子一代的对比，也有年长者与相对年轻者的对比。老眼年轻时很勇敢，曾在大学时代跳入冰湖救起过一个“臭老九”，却在人到中年后成了小区一“霸”。应敏和秦烨年轻时也很勇敢，大学时代曾在食堂插队的“大力佬”奋力抗争，曾经为了爱情而反抗学校的种种规定，中年后也只能在网上逞勇。到了下一代，“勇敢”愈益萎缩变异。以小说开头的那个年轻女孩为例，她目睹老眼中风摔倒也只敢打物业电话或者说最多只愿意做到这一步，至于应敏秦烨的儿子出国留学却在假期都懒得回来，可是旅游的费用又要依靠父母。《夜间暴走》是黄咏梅近年来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不仅因为它有很深的时代思考，还在叙事技法上颇得门罗之风。门罗最大的特点就是“藏”或者说“留白”，水面上有时甚至只有一个“冰峰”。在黄咏梅近年“自我革命”的作品中，“代际”与“往昔”的关系常常在冰山一角的闪烁间露端倪，而这代作家对历史的思考也由此折射了出来。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写作者的「自我革命」

——黄咏梅的叙事之变

□曹霞

■ 评论

《热血：东北抗联》：刻写血染黑土地的民族精魂

□丁晓原

吉林作家李发锁以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创作的实绩，有闻声于文坛。数年前读到他的《围困长春》，作品透视焦点长春，辐射东北解放战争的宏大历史，显示出作者非虚构叙事重大历史题材的卓越能力和史识。新近推出6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热血：东北抗联》(全二册)，令人感动。这部作品的创作用时5年，作者出入于史料档案之间，“行走”在沉郁悲壮的山山黑水历史现场。如果不是抗联先烈精神对作者意志的激活，没有作者自我深挚文学情怀的激活，我想也许很难顺利完成《热血：东北抗联》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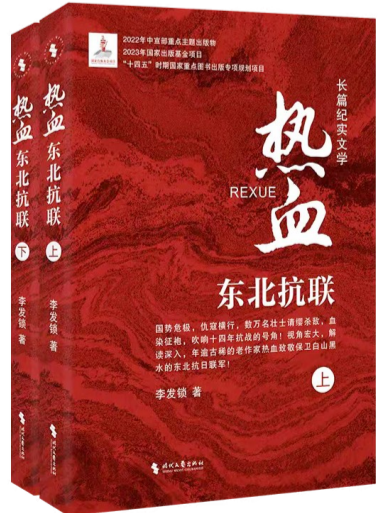
《热血》的扉页上题写着“献给杨靖宇将军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其实作品要“献给”的不只是杨靖宇将军，而是成千上万九死一生的东北抗联将士。“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名称，是杨靖宇于1934年2月最早提出的”，而正式指称的是1936年2月20日发出《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地抗日武装的总名。毛泽东曾说过，东北的“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东北抗联不仅直接重创日伪武装，

而且牵制了大量的日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为抗日的英雄部队，东北抗联有为各种文艺形式所反映的重大题材，其中多有纪实文学加以开掘记录的。这些纪实作品中各有事的重点，李发锁的新作则是对东北抗联的整体观照。作者基于书写对象相关联的历史逻辑，秉持宏阔开远的大历史观，打开东北抗联非虚构叙事的思维和视野，将其置于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历史错综复杂的大格局中加以观察呈现。《热血：东北抗联》写作思维所具有的“总体性”，使其在同类作品中另见气象，东北抗联是作品叙事的主体和重心所在，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就事论事。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存在的前提是日本入侵，而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得逞，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实施“不抵抗主义”，其中还纠缠着其他的国内国际因素。全书共20章，第一章《岛国象心》和第二章《割肉饲虎》不仅给出作品叙事大的历史背景，而且更真实地揭示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逻辑。阅读这两章内容，读者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相关历史信息，而且可以建立起认知作品叙事的整体图式，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东北抗联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重大的历史意义。

《热血：东北抗联》是一部以人物叙事为中心的纪实作品。就文本的主要内容而言，这是一部关于东北抗联将士的人物志，它刻写着一个个血染黑土地的民族精魂。写人的物数以百计，其中有著名的抗日将士，更多的是无名的英烈和心向抗联的百姓。而且，不仅记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而且不忘此前自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各路义勇军。“民族是一个神圣的词语，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认同。”这些义勇军不仅是后来建立的抗日联军的重要基础，而且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们率先自发抗日的勇武和牺牲，其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不畏外敌、挺身搏击的担当引领精神理当一样载入史册。作品写入了“九一八事变那个夜晚，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忠勇警士高曙光”、“以五尺之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取”明志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邓铁梅等“铁血勇士”抗敌殉国者的英名和事迹。作者据此叙事写人，完整真实地写出了东北抗联的前生今生，显示出历史叙事应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对历史客观自在的尊重。作者更多的笔墨用以记写热血救亡英勇抗日的共产党人，他们中既有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著名将士，也有像智勇双全大义灭亲的田仲熊、为掩护战友撤退而牺

牲的高禹民、为国捐躯的抗日夫妻张耕野、金凤英等并无闻名的英雄。作品对这些人物没有停留在对其故事的叙述上，而是基于故事挖掘凸显他们敢于、甘于为民族而牺牲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坚定的信念信仰。赵尚志虽屡遭曲折，但初心不改，以身殉国；杨靖宇虽深陷重围，却说：“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外国人投降的”；赵一曼在家为国、儿子情与民族义之间，毅然选择“为国而牺牲”。这些英雄的精神感人至深，他们的形象毅然矗立于历史的星空之中。作品采用以反求正的对比方法，反衬出杨靖宇等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和凛然大义。

李发锁注重事必有据，言从史出，作品每章都有详细的注释，全书附有大量的参考书目，形制上近似史学著述，具有显著的客观性特征。但与此同时，这部作品又有鲜明的主体色彩和理性精神，体现为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人物和事件作有许多直接的解读论评，这些论说文字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思考认知，同时也可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作品的要义。“东北军如此雄厚之兵力(20:2)，如此精良之武器，为什么总体上如此温顺如绵羊？‘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抗惨了！”一言直叩



《热血：东北抗联》，李发锁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

题的要害。“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面对多么巨大的困难，都始终如一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这是作者对赵一曼故事的深论。“叛变，在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尤其在东北抗战中，是无法逾越的一个话题，大量的伪军、汉奸、叛徒的出现，是深深烙刻在中国人心中一道惨痛的伤疤。”这样的观点发人深省，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力度。要而言之，《热血：东北抗联》是一部精彩精深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历史教育的纪实文学教材。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